

道德科学知识

上海市伦理学研究会



学习丛书

道德科学知识

上海市伦理学研究会

参加编写者

翁金墩	包连宗	盛宗范	严缘华
颜迪民	王玉山	尹继佐	忻才良
肖万全	徐冲德	周 耘	陈根法
张家骏	陆俭家	郜 峰	魏道履
蔡子文	潘颂德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毅辉
封面装帧 杨德鸿

道德科学知识

上海市伦理学研究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兴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75 字数 290,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书号 2074·404 定价 2.05元

序 言

自从脱离了野蛮时代以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不断地建设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标志。物质文明固然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但是，没有精神文明的发展，光有物质文明的建设，就象没有灵魂的僵尸；而且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来说，这种物质文明的建设，是不牢靠的、跛足的、虚弱的。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当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腐朽，并日益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的精神文明也就首先与物质文明脱节、停止向前发展以至背道而驰，终至使已有的物质文明停滞不前，只有爆发革命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才能解放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重新上升和发展。唯有在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方式，才始终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紧密结合，相互促进而不断发展，并且以精神文明的发展来保证和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

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有两种上层建筑：一种是政治上层建筑，一种是思想上层建筑，而道德是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的。但是，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决定了政治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客观上不能不处于主导地位；道德同其他思想上层建筑比较起来，更接近于政治，在阶级社会里，任何阶级、任何职业、任何个人（社会成员）之间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都在客观上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一定民族、一定阶级、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政治要求，而且，道德一经成为群众性、社会性风尚，它就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不能不影响于整个社会秩序，从而也就成了政治的问题。政治和道德的这种性质和相互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例外。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道德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理所当然地不能不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人们道德风貌的好坏、高低，还会直接关涉到他们在生产建设和其他工作、学习中的精神状态；作为社会生产力中最主要、最重要因素的人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无疑也就会对各项建设工作直接起着促进的或者促退的作用。

我们党一贯重视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关心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在党与非党的人民群众中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更日益加强了对全党、全军和全民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更明确地指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这就同时也是更加强调了提倡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对于建设高度民

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意义。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还严肃地指出：“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的思想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开共产主义。”我们的道德生活，当然也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开共产主义。因此，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提倡和宣传共产主义道德，便是犯了所谓“超越历史阶段错误”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这就给予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研究以很大的强有力的支持。

把精神文明的建设，尤其是把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从我国的历史和时代的特点来考察，就更可以看到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旧的社会制度被我们推翻了，存在过几千年的剥削阶级也都作为阶级被我们消灭了，但是，反映着旧的社会制度和剥削阶级的道德意识中，作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残渣剩汁，却不可能象死尸那样抬出去火化了就算了结，它会钻进人们的头脑，甚至会留传下一代以至下几代，隐蔽地在人们的思想中发霉、发臭、发酵，腐蚀着人们的灵魂，一遇到适宜的气候，它就免不了又会扩散开来。解放初期，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进展，我们党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合法地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和思想修养的宣传，我们的党和人民解放军在数

十年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起来的优良作风和道德传统，更形象地、生动地和深刻地感染着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的道德风气为之大变，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旧社会的那种封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腐朽道德，还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特有的那种崇洋媚外的买办阶级道德，以及流氓无产阶级道德，并没有也不可能就已经在所有人们的心灵中连根拔除掉了，它们还会象一切传染病的病菌、病毒那样，在某些人的神经系统中，暂时地潜伏着。

果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理论上反对一切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公然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诬蔑为“黑修养”，疯狂地迫害宣传、研究共产主义道德和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同志，实质上是在宣传“权力即道德”的非道德论。而在实践上，他们却竭力推行没落资产阶级的和封建法西斯的道德，鼓动旧社会的那些腐朽的以至反动的道德沉滓泛起，泛滥成灾。更由于他们的这一切，都是盗用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进行的，这就使得众多缺乏新旧社会经历对比的青年们，也包括许多善良的但又缺乏政治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们，以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存在着一种信心不足的虚无感。他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把“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错当成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必然；把林彪、“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错当成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把那些被他们所歪曲和颠倒了种种谬论，其中也包括关于道德领域的种种谬论，错当成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由于旧社会那种腐朽的反动的道德影响，在长时期内仍然吞噬着一些人的心灵；加上国际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各种敌对势力还有计划地企图从道德腐蚀入手来同我们争夺下一代；人们的思想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造成了许多弱点和空隙，从而使这些肮脏的道德风气，也侵入到我们党的不少党员的肌体中来。所有这些，就构成了当前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种种不正之风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近两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整顿党风党纪，并且逐步地采取了一系列比较有力的措施，才有所好转。但是，积重难返，“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不可低估，所以，在道德领域内的拨乱反正工作，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开展和加强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研究和宣传。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反对抽象地超现实地道德说教的；西方的某些伦理学家们居然便据此诬蔑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道德和摒弃道德教育。对此，列宁早在《共青团的任务》中作了斩钉截铁地有力驳斥。但是，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有些同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同已往那些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伦理学的根本区别；不懂得必须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明道德现象，才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根本出发点；从而，当资产阶级以至那些为已往封建统治阶级意识辩护的伦理学家们，用变换了花色的手法来进行渗透时，或是认识不出而将其误认为可以“补充”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或是打不中要害、驳

02/14/14

斥无力。

我们应该明白：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其所以不同于宗教道德和已往任何伦理学的道德说教的地方，不在于它抽象地教训人们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而在于它是按照科学原理，揭示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并不是单个人与单个人之间的自然关系，而是社会成员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告诉人们为什么要遵循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指出共产主义道德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指出它对社会发展的客观的促进作用和它的无限生命力。而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真正从内心中信服，从而逐步变成自觉的行动，形成他们牢固的、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革命的老同志，正是靠这一点识破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伪装和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从而，在那种艰难复杂的岁月中仍能挺住迫害，并且采取了多种方式的斗争。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他们又继续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既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决地反对各种“左”的错误倾向，实事求是地拨乱反正；又敢于坚持党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怕围攻、不顾嘲笑，坚定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同那些对党、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动摇的人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直至展开必要的、适当的思想斗争。可是，也有另一些同志，尽管已往的战争年代和地下斗争环境中历尽熬煎、在“文化大革命”备受迫害的情况下，也曾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所理应保持的气节和品质；但恰恰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解，并不是真正建立在牢固的唯物史观的科学

基础之上的，所以，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他们却被复杂的社会现象搞得眼花缭乱，错误地接受所谓“教训”，反而对他们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所曾经为之艰苦奋斗过的社会主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动摇情绪，逐渐被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腐朽的道德意识所污染，其中有的人甚至发展到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一正一反的两种情况，都密切相关到现实和长远的社会道德风气的盛衰，关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成败。正因为这样，无论从当前现实的斗争来考虑，还是从长远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战略任务来考虑，今天广泛地、深入地认真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就都万分必要了。

有鉴于此，上海市伦理学研究会的部分同志，经过一番切磋琢磨，共同编写了这本《道德科学知识讲话》。这本《讲话》，虽然还未必成熟，而且肯定还不免存在着某些不够精到、不够准确、不够协调和不够完满之处，但是，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参加编写的同志们，是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统一上比较通俗地来阐述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基础知识，力图避免把道德科学变为训条和概念的堆砌、变为思辨的经院哲学的。他们为此一再修改而花费了辛勤的劳动，从而也必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也还要指出，它并不是一本直接论述和宣传具体道德规范的书，因而它不可能对各个道德规范作出详尽的论述和列举生动的事例；它也并非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研究的专著，因而它也不可能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著作的体系作出重大的突破。它主要地只是企图给人们以通

俗地、初步地理解共产主义道德、划清它同各种不同阶级的阶级道德和道德学说之间界限的武器，而这个目的，依我看是基本上能够达到的。故乐为之序。

1982年5月周原冰病中初稿

10月改定

1983年12月修订。

增订本序言

《道德科学知识》是在上海市伦理学研究会部分同志编写的《道德科学知识讲话》的基础上增订的。初版时，我曾为《讲话》写过一篇序言。那是1982年5月我因胃全切除手术刚出院，应主要负责编写和统稿的同志委托写的，同年10月又根据党的十二大文件略作修改。由于共青团中央的推荐和全国振兴中华读书运动的蓬勃开展，《讲话》已重印多次，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并将其列入“学习丛书”。本书编写组同志趁此机会作了较大的修订增补，又要我再写一篇序。我以为原序反映了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真实情况，仍有保留的必要，所以对原序只在文字上作些修饰，内容基本未动；原序未曾谈及的，现在再谈点看法。这些看法当然只是我个人的，并不代表上海市伦理学研究会或全国伦理学会其他同志们的意见。

作为伦理学说，我国已往的思想家们几乎没有一个是不曾论述的。他们的这些伦理学说，尽管各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作为思想资料，总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可资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从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探索人们的道德思想和道德教育的发展规律。因此，谁也不能无视这

笔遗产的客观存在，谁也无法断然拒绝这笔遗产；问题只在于：应当站在什么立场上、用怎样的观点和方法去对待这笔遗产。

作为近代和现代的伦理学说，我国在五四运动前后，就曾以“人生哲学”的面貌，展开过持续反复的论辩。在这些论辩中，同时也就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在中国当时思想界的影响，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同历史唯心主义的道德观之间的斗争。

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工作，我们党从建党之日起，就从未放松过，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不仅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许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就作过许多精辟的阐述和发挥，而且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也以革命人生观和青年修养等类形式，写过不少小册子和文章，对于当时思想战线的斗争和诱导广大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五十年代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配合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对共产主义道德科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系统地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留下了大笔财富。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系统地去研究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那还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才在少数同志中开始进行，而后逐步展开的。

1963年开始，发生了一场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并非如同有些人所了解的那样，是什

么关于对已往的伦理学说是否应该全盘否定，或者是什么是否可以一般地否定道德的继承性问题：因为事实上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过全盘否定已往的一切伦理学说，或者主张过要一般地否定道德的继承性。当时争论的实质，是在于：（1）敌对阶级之间有无共同的道德？敌对的阶级道德都反映同一时代的时代特点，能否作为它们之间存在共同道德的论据？（2）在同一个阶级社会里，是否只存在统治阶级的道德而不存在被统治阶级的道德？统治阶级的道德在当时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能否便等于它是全社会唯一的道德？（3）道德究竟是主要产生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人们的社会存在，还是主要来源于已往的道德学说甚至道德训条？究竟谁是源，谁是流？（4）能否说，“无产阶级若不继承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便没有自己的道德”？能否因为共产主义道德也不免使用了已往统治阶级道德中的某些词汇或概念，便说共产主义道德是从这些统治阶级的阶级道德一脉相承而来的？（5）封建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某些优良品质（如岳飞的爱国，包拯的刚正……等），能否说成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道德？能否因为岳飞的爱国主义反映了宋代人民的民族性，便从而否定它还具有阶级性？（6）批判地继承已往优秀的道德传统和道德学说能否等于简单的“移用”、“摘取”或“抽象继承”？封建统治阶级中某些思想家的道德学说，是否便等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道德？道德和道德学说的阶级性同作为某个阶级所特有的阶级道德之间是否可以划上等号？

这次争论，开始是健康的、正常的学术讨论，它使我们打

开了思路，明确了不少问题，对于开展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可惜后来逐渐变质，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竟至把这场学术上的争论也变成了进行政治迫害的借口。首当其冲是吴晗同志，他及他的全家都遭到了极不应该的残酷迫害，我们是永远给予同情的，同时，很多不同意吴晗同志观点的同志也被说成是宣传吴晗的道德论，而作为一项罪名，同样遭到了严重的迫害，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因而，从此就客观上把研究和讨论道德问题人为地变成了禁区。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下，是非颠倒，善恶不分。他们在实践上奉行和实施的是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道德，让旧社会各种腐朽、反动道德的沉滓，竞相泛起；在理论上，他们实际上是在大肆推销“非道德论”，连刘少奇同志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被宣布为“黑修养”而大加挞伐，同时，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同志，也很少不被关进“牛棚”而横遭摧残的。

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以后，情况才有了好转。经过1979—1980年的呼吁和酝酿，终于在1980年6月举行了全国第一次伦理学讨论会，并且正式成立了中国伦理学会。由于党中央的支持和推动，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和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才又重新获得了生机，那次会议，绝大多数与会同志是坚持正确方向的，一面强调和阐明了宣传共产主义道德、研究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同时提出了开展职业道德研究

的号召；一面针对当时情况，驳斥了“向钱看”的价值观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思潮，对于认为宣传雷锋精神便是提倡所谓“奴隶主义”、“苦行主义”的种种错误说法，也及时作了有节制的批评。会后，许多省市先后成立了伦理学会或伦理学研究会，许多大专院校陆续开设了伦理学课程，中小学也加强了道德教育，报刊上发表关于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理论文章日渐增多了。

可是，在为吴晗同志平反的同时，有人提出也要为吴晗同志进行什么学术平反，这就把学术上的是非问题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了。有人公开指责：包括列宁在内，在社会主义社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是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倾错误”，甚至把这说成是在我国产生“四人帮”的根源！有人重新拾起合理利己主义的陈词滥调，宣传什么“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而形形色色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以个人为中心的“人的价值论”，也开始被一些人抬出来：不是从研究社会的发展规律出发，也不是把解放全人类、彻底消灭产生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根源、使人们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而是把可以概括好人坏人、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有道德的人和败坏道德的人在内的抽象的“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地”，用人的自然需要来解释道德的起源和存在、发展的根据；不是实事求是地、有分析地肯定人道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也不是从实际出发指出它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种起码的道德准则及其在今天尚有的现实意义，而是把这种人道主义

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甚至竟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为等同或者从属于抽象的人道主义，使抽象的“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人性论”等等，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实际上便把人类社会、人类的社会价值、人的社会本质和社会需要，以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特别是其唯物史观，统统贬低到次要的、附庸的地位，变成可有可无了；一时间，历史唯物主义大有被变成了历史唯“人”主义的样子。当然，这些错误的思潮和论点，并不全然是属于道德领域的问题，但它们是大量地和直接地冲击到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领域的问题，因而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同志们也就比较敏感，各地伦理学会、伦理学研究会的不少同志们，都曾以不同方式、程度不等地对之进行了论争，其中也包括了上海市伦理学研究会的部分同志。

1981年在安徽屯溪举行的第二次伦理学讨论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当时，邓小平同志早已明确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也已通过和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就使得会议更有了明确的方向，与会的同志们也都能遵循中央指出的方向切磋琢磨。会议着重从道德和道德学说的领域，讨论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特别是深入地分析了加强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开展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探讨研究，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讨论了关于伦理学研究同坚持党